

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续）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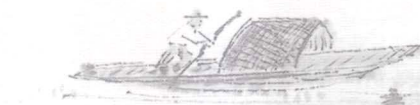
黔南丛书

第四辑

【下册】

黄彭年诗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规划重点图书（续）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续

黔南丛书

第四辑

【下册】

黄彭年诗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dcv34/0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续黔南丛书. 第4辑(上、下册)/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221 - 09795 - 8

I. ①续… II. ①贵… III. ①地方丛书—贵州省  
IV. ①Z122.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723号

## 续黔南丛书

(第四辑)


(上、下册)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


---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装帧设计	熊 锋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140千字
印 张	95.75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795 - 8
定 价	245.00元(上、下册)

---



本项目获贵州省新闻出版基金资助



续黔南丛书 第四辑(下)

# 黄彭年诗文集

【清】黄彭年 著  
李华年 点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编辑委员会

- 总 顾 问 龙志毅
- 顾 问 蒋南华 范同寿
- 主任委员 顾 久
- 副主任委员 王德玉 蒙育民 程鹏飞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常务)
-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于民雄 王羊勺 王尧礼 何 萍
- 张伟云 张祥光 张新民 李立朴
- 李华年 李黔宾 陈 琳 翁家烈
- 黄万机 程亦赤 谭佛佑

## 编 辑 部

- 主 任 王羊勺
- 副 主 任 王尧礼 陈 琳
- 编 辑 郝向玲 郎启飞 胡海琴

# 点校说明

本书收入黄彭年的《陶楼诗钞》、《陶楼文钞》和《紫泥日记》三种著作。

黄彭年(公元1823—1891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二十七年为翰林院编修。后随其父黄辅辰回贵阳办团练。同治初,入川督骆秉章幕,助其平定石达开。后受陕西巡抚刘蓉聘,主讲关中书院。又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聘,主持纂修《畿辅通志》,并主讲莲池书院。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授湖北安襄郢荆道,九年迁按察使,十一年调陕西,署布政使,不久回任湖北按察使。十四年(公元1888年)任江苏布政使,一年后署江苏巡抚,十六年(公元1890年)任湖北布政使,翌年在湖北任所去世。史称彭年“廉明刚毅,博学多通”,他年轻时即以才华学问知名,时人也为他在行政上的才干到晚年才略得施展而感到惋惜。他在教育、学术、行政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在学术上,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

和历史上的士大夫一样，诗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境遇、时事评论、人生感悟、学术见解、文艺评论、友朋酬应、理想追求，都常常采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但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而不在诗。他的诗歌有很突出的散文化的倾向，他有不少很生动的叙事诗，很深刻的说理诗，但动人的抒情之作则不多。我个人的看法是，他的诗，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高于审美价值。我们也不必要求一位博学多通、思维缜密的学者，一位廉明刚毅、爱民如子的官员，同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只要他作为学者和官员所具有的美德，在他的诗中有完美的体现，我们就应该满意了。

黄彭年少年力学，天资聪颖，故博学多通。其为学汉宋兼采，力破门户之见，而立论则以孔孟仁心仁政为依归，以身体力行为根本。

他生当前清末造，身历内忧外患，又能以客观的态度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和各色人等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对社会的乱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他父亲黄辅辰的榜样和他本人刚直的秉性，又使他有鲜明的是非和爱憎。正是这种鲜明的是非爱憎，使他的叙事之文充溢着强烈的感染力，其史料价值更为时人和后人所推重。

他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关键在用人和行政。用人应以德为主，主张“用人以公，行政以诚”，他认为政府官员只要有爱民之心，就能找到民生疾苦的原因，就能探索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心不到，说得再好听也无济于事。他在《平贼议》中说：“凡百姓之颠沛流离，由守令之贪刻；兵丁之离心解体，由将弁之寡恩。守令将弁之失，由督抚提镇之不职；督抚提镇之不职，由简任之未精。”把批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要求皇



帝“特沛纶音，深自引咎；切责大吏，与之更新”。他认为所谓盗贼蜂起，大半是官逼民反，而贵州少数民族闹事，也多半由于大民族的压迫。在那个时代，能把这样的见解形诸文字，是需要极高的胆识、需要极坚定的道德信念和使命感的。

黄彭年十分重视教育，他认为八股文虚浮空洞，因而强调实学，即对为官治民、社会进步有实际用处的学问；同时强调力行，认为学了孔孟之道，学了历史上和现实中仁人志士的事迹，都应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他在自己为官之地，都为当地书院广置典籍，并亲自课士。他当了道员以上的高官后，更为自己属下的地方官办“学律馆”，教他们学习法律，也是为了整顿吏治，为了叫百姓受到相对公正的待遇。

在学术上，黄彭年重视解决实际问题，但反对一窝蜂赶浪头地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同时，他也能与时偕行，比如他对当时的显学——边疆地理，就有很深的研究。他也不排斥西学，甚至还为介绍西方地质学的译作写序，很准确地概括了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黄彭年不是开宗明义的大家，但他在如何做人、如何为学上，为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切实的忠告。他的散文作品，虽然只有区区二十万字，但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他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多方面的，可信的史料。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黄彭年护理江苏巡抚时，曾充任两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苏。乡试监临，因此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紫泥日记》。因监临办公例用紫色书写，故有此名。黄彭年熟于掌故，在日记及所附的诗作的自注中，对隋唐以来科举考试，特别是明清以来“乡试”省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有资格参加会试，即进士考试。的考试门数和题目范围的变化，考务人员的组织、分工、

工作程序等,都有详细的考察和记述,为我们了解清代乡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黄彭年在充任这次乡试监临之前,得过一次轻度中风,即所谓“脑梗”,实际上是带病工作,但他在从苏州赴南京的往返旅途中,还是顺便考察了上海南京间河道淤塞的情况和原因,对如何治理,也有些初步设想。在考场上,对工作也一丝不苟,对下属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对旅途上见到的老百姓的疾苦,他也感同身受。通过这本日记,我们可以对什么是旧时代的“好官”,有个直观的了解。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这次点校所根据的版本。

《陶楼诗钞》原无刊本,系黄彭年第四子黄国瑄之次子黄襄成由黄彭年日记中钞出,其《别集》则从黄彭年次子国瑾所藏卷册抄出。这两个抄本又经朱启钤抄录校订,朱氏又请濮绍勘、邢端、瞿兑园诸人校订,最后由朱氏总其成。惜朱氏得见黄彭年日记时,日记已残缺蠹蚀,不堪卒读,不久又不知落入谁手,终于无法按日记来订正抄本的讹误。好在《诗钞》从日记录出,虽非录于一时,未必没有先后间错的情形,但大体还有编年的遗意。邢端又把所见四十四册日记的起讫日期和所记黄氏主要经历编为《黄子寿先生日记目》,诗钞与《日记目》相参,略具编年的规模,给我们研读黄彭年诗,提供了相当的方便。

《陶楼诗钞》四卷,《外集》一卷,于1960年由朱启钤作为“紫江朱氏编印黔南丛书之一”油印若干部,此次点校,即以油印本为底本。刻蜡纸的书手工作相当认真,偶有笔误,我们都随文改正,并做了校记,附于各卷之后。陈田《黔诗纪略后编》、徐世昌《晚清簪诗汇》、钱钟联《清诗纪事》、李浚之《清画家诗史》,或多或少都选录了黄彭年的诗,陈、徐所据,均非黄

氏日记,《纪事》、《诗史》所录者,亦经转抄,朱氏油印本出自黄氏日记,且经多人认真校订,应是最可靠的本子,故本次校订,没有采用以上四书。以上四书所收诗作为《诗钞》所无者,编为附录。油印本书末原附王树楠撰《黄子寿师〈陶楼文集〉序》,今移入《陶楼文钞》,故删去。《诗钞》原无目录,今为编目列于卷首,以便省览。

黄彭年文集,目前能找到的只有他的学生章钰、胡玉缙、高德馨等人整理编订,于1923年出版的《陶楼文钞》十四卷。章钰提到此前曾有活字印刷的《陶楼存稿》,我们没有见到。这本《陶楼文钞》的基础,是黄国瑄提供的十卷稿本,经章钰等人增补,成为这个十四卷本。王树枏所见的,也只是黄国瑄手中的十卷稿本。《文钞》须要出校的地方不多,故校语列于各卷之末。黄氏弟子陈定祥撰《清黄陶楼先生彭年年谱》,于咸丰八年、同治十三年、光绪十二年,分别附集外文三篇,因《年谱》已收入本书附录,故该三文也未予另编。

《紫泥日记》,我们点校用的底本,是1963年北京图书馆根据“己丑(光绪十五年)冬陶楼校刊”本转抄的手抄本,该抄本每半页八行,行十六字,估计原刻版式如此。我们找不到原刻本,故只能把抄本的笔误改正,又把日记中的引文与原书做了校对。原抄本用钢笔抄写,有抄手以外的人用毛笔改正的地方,我们全都遵从,估计他是依据刻本改正的。

《紫泥日记》中,录有黄氏诗、文若干篇,因《日记》与《诗钞》、《文钞》同册付印,故没有抽出另编。

目前,各地拍卖行尚有黄彭年书简若干通,另外民间还有与平定石达开有关的《黎雅日记》抄本流传。那些书简可在网上查到,《黎雅日记》抄本固然难得,也不是绝对得不到,我们

想,在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确认了其可靠性之后,再把这些资料点校付印,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此次点校,得到陈琳、王羊勺、王尧礼、王力诸先生的协助,谨此致谢。

黄彭年的传记资料,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我之所以选择点校黄彭年的诗文,除了对他的著作本身价值的考量,还有个人感情的因素。我是天津人,天津旧属直隶,黄辅辰、彭年、国瑄三代都曾在直隶工作过,都曾亲履我的生身之地,辅辰、国瑄更曾为津沽士民的福祉呕心沥血。我躬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校出版《续黔南丛书》的盛举,正好借点校他们的著作,报答他们对直隶士民的恩德于万一。

本人学殖荒落,本书的点校有不当之处,尚乞广大读者、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点校者

〔清〕 黄彭年著 李华年点校



陶楼诗钞

『续黔南丛书』第四辑（下）

# 陶楼诗钞序

瞿蜕园

有清道光以后，吏治尤敝，宇内嚣然不宁。西南各省，民苦于虐政，相率奋起与统治者抗。少数民族尤被歧视，诛求无厌，动即兴兵滥杀，是以义旗纷起，如火燎原。统治者逞其淫威，犹以戡乱自慰。今日求其真相，则但存官书粉饰之词，谓为信史，何可得也？惟当时身历其境者，记其闻见，或犹于字里行间暴露一二，差异于官样文章。其人固犹是士大夫，其言固非人民口中之言，然取以为参考资料，则聊胜于无也。

紫江朱蠖公，昔年有《贵州碑传集》之辑，余亦曾从事其间，每具此感。贵州为少数民族主要地区之一，史事往往与滇、桂、川、湘等省相连，文献无征，滋为可惜，此蠖公之志，余亦有志焉，是以每遇有关之日记、年谱、手稿，必竭力为之表章。往者曾于德化李氏藏书中得见数种，唐鄂生炯之日记在焉，此即重要资料之一。顷来北京，蠖公复以发现黄子寿彭年日记始末见告。黄氏之孙襄成，初秘不示人，及其病废将殆，始属其友出以求售。蠖公曩固尝告襄成出其先世遗著图象，为谋归入贵州

文物之列，而襄成疑为攘夺，坚讳不言，至是不得已，始出而求博升斗。蠖公尝一寓目，凡自道光丁未(二十七年 公元 1847 年)至光绪庚寅(十六年 公元 1890 年)计四十四册，其中已颇多蠹蚀破损。事未克谐，而襄成已逝。闻其家售于无知者，仅获给殡葬之资，卒归谁手，不可诘矣。

蠖公既无力购其日记，则手录其中诗篇，冀与已刊之《陶楼文钞》相辅而行。原稿字多潦草漫漶，襄成尚有从他卷册中抄得者，尤为芜杂。爬梳芟薙，排比年月，粗可成卷。贵阳邢冕之端，亦与有董理之功焉。

详观其诗，固不能越当时习俗范围，然所载事实，则有他书所未备者。官吏豪猾，狼狽为奸，欺压人民，已可概见，不得谓非治史者所宜珍视。

黄氏父名辅辰，官至陕西凤邠盐法道，兄名辅相，官至广西镇安府知府，署右江道；彭年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主修《畿辅通志》，出任湖北安襄郢荆道，终于湖北布政使，皆当时所号为能吏者也。

蠖公于彭年为再传弟子，彭年之子翰林院编修国瑾，即蠖公与余之姨丈。国瑾之《训真书屋遗稿》，亦几于湮没，十余年前余与蠖公共求得之，刊入《黔南丛书》，今不得以《陶楼诗钞》并为一帙，不无遗憾。然吾辈生当今日，氛雾尽豁，私见悉除，举凡有益于文化事业者，必不任其沦灭，若仅以乡里姻连之故，而私相引重，又其浅焉者已。

余既久住江南，顷复北游，重寓蠖公京邸，出是编属为勘定。行踪倏忽，齿发渐衰，已无能为役，然蠖公年将九十，犹勤勤若此，其敢诿谢而不缀一言乎！当世宏达，或有取焉。

公元 1959 年 7 月瞿蜕园

## 陶楼诗钞识语

甲午(公元1954年)仲春,中央文史馆濮绍勘君过访,告余曰:“最近发现贵州黄子寿先生手写日记四十余册,为其文孙襄成字君伟所保藏秘本,君伟现已卧病在床,家属将以此捐献政府,希望畀以文史馆位置。素知我公搜罗贵州乡邦文献,敢以奉闻。公若有意于此,愿为致力说合。”余答曰:“黄寿老吾先君之师,又为至戚也。君伟为吾姨丈再同先生胞侄,其先人秦生为畿辅循吏,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出任四川巡按使。渊源至深,非止桑梓之谊。昔年余校刊再同丈《训真书屋遗稿》,杀青既竟,遍<sup>①</sup>赠乡人,曾向君伟询问其先世遗著,可否汇入《黔南丛书别集》,彼仅以章式之集资刊行之《陶楼文钞》相示,并谓‘尽在是矣,其他著作,均在长沙堂兄黄厚成手中’。厥后贵州文献编辑馆凌惕庵来函,征求贵州先贤遗像,邢冕之太史亲诣其家,访求琴坞先生及寿老、再同丈三世影像,竟严词峻拒不与,且诟及同乡谋夺家珍。何以寿老日记手稿倩友代为装池,而乡人转不得一见,吁可怪也!”兹闻其人已病废不能起,始欲以此作干禄之阶。余不忍



坐视，乃与章行严兄协商，属濮君致意慰问，若欲献礼，请先将原书取出，公开阅看。

越数日，濮君果赍原书以来，呈行老先阅，余亦得于旁席一一审视，虽经其友闽人陈莼衷衬托装订，而中间蠹蚀水渍，仅馀半段或四边俱残蚀，不堪卒读者，尚若干卷。世家文物，凋敝若此，诚不胜惋惜。此稿留我家月余，又送冕之参阅，冕之为录出目次一卷，时与地稍觉犁然。濮君奔走其家，君伟喑不能言，仅以石板著粉笔问答，更知其家境凄绝，非得急救济不可，但文史馆绝不能收容笃疾之人，且彼昔曾依附权门，犹为众所属目，行老亦爱莫能助，遂以原书返还其家。我只属濮君逐日至彼处，细审日记，编一年谱，或将其记中古近体诗录出，以备继再同文遗稿印入《黔南丛书别集》，姑存其目，作此幻想而已。不幸濮君亦得心疾，年谱既未编就，君伟又逝世矣，线索因此中断。

冕之云：“濮君斋中留有君伟手抄《陶楼诗集》四册，据其自记，全从日记中录出，其《别集》则从秦生文所存卷册抄附若干首，首未分卷。且日记本虫蚀部分，断简残字，无从辨证之诗，只以‘失题’纪之，以待旁证。”君伟抄稿既非一夕一朝之事，编写草率，不免凌乱。濮君继亦身故，黄氏子某来索诗钞原本，我虽手抄一过，尚待与日记一校，问其家人，则云“日记全部已卖与书估，只得数百元，为君伟身后丧葬之费。”呜呼惨矣！寿老手写日记，如果君伟于廿年前出示我辈，吾与邢君合力共筹一二千元为之刊行，尚属可能。即不然，向贵州文献图书馆介绍收购，亦不致为负贩者所赚，竟使原书下落无从踪迹也！总之，余交臂之失，由于处境拮据<sup>②</sup>，正在斥卖长物度日之时，其遗憾抑何可言？兹就抄存《陶楼诗钞》四卷、《外集》二